

ISSN: 2330-4812

自然与人生

Nature and Human Life E-Magazine



6

2015

《自然与人生》电子学术杂志

《自然与人生》(ISSN:2330-4812)是环境人文的电子学术杂志,环境人文的侧重点在环境伦理与环境美学。杂志的使命是促进中西方学术界在环境人文领域的交流,同时促进公众对环境人文思想的了解。本杂志一年在线出版四期。

编辑团队

主编

高山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系
E-mail: sgao@suda.edu.cn

副主编

程相占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E-mail: sducxz@163.com
卢风
清华大学哲学系
E-mail: lufeng@mail.tsinghua.edu.cn

书评编辑

张卫
华中师范大学哲学系
E-mail: hnhszw@163.com
约翰·博克
日本宫崎国际学院
E-mail: jparker@sky.miyazaki-mic.ac.jp

编辑顾问

- 尤金·哈国罗夫[美]: 美国北德州大学
- 里卡多·洛兹[美]: 美国北德州大学
- 倍德·科里考特[美]: 美国北德州大学
- 杨通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
- 保罗·汤姆森: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 戴维·库伯[英]: 英国达拉谟大学
- 王建明: 苏州科技学院
- 姚晓娜: 华东师范大学
- 陈望衡: 武汉大学
- 周国文: 北京林业大学

Nature and Human Life E-Academic Magazine

NATURE AND HUMAN LIFE (ISSN:2330-4812) is an E-Academic magazine of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especially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The mission of this magazine is to promote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and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to the public. This magazine is published online four times a year.

EDITORIAL TEAM

Editor-in-Chief

Shan Ga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ochow University

E-mail: sgao@suda.edu.cn

Associate Editor

Xiangzhan Cheng

Research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 Dong University

E-mail: sducxz@163.com

Feng L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E-mail: lufeng@mail.tsinghua.edu.cn

Book Review Editor

Wei Zh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hnhszw@163.com

Jonathan Parker

Miyazaki International College

Email: jparker@sky.miyazaki-mic.ac.jp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 Eugene Hargrov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 Ricardo Rozzi,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 J.Baird Callicott,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 Tongjin Y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Paul B. Thomps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 David E Cooper, Durham University, UK
- Jianming Wang,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Xiaona Yao, East Normal University
- Wangheng Chen, Wuhan University
- Guowen Zhou, Beijing Forest University

《自然与人生》电子杂志 2014 年第 6 期

目 录

杂志新闻 NEWS

绿色视野 PERSPECTIVES

- 在道的语境下反思环境问题：为什么道家是或不是环境保护主义..... 保罗·安布罗/文 刘思捷/译 P2
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a Daoist Context: Why Daoism Is and Is Not
Environmentalism..... Paul D'Ambrosio
“真正的荒野是洁净的”：缪尔、反人类主义与泥土美学..... 西蒙·P·詹姆士/文 齐君/译 P12
Nothing Truly Wild is Unclean”: Muir, Nisanthrop, and the Aesthetics of
Dirt..... Simon P. James

绿色访谈 INTERVIEW

- 论环境哲学：尤金·哈格罗夫访谈.....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文 赵红梅 高山/译 P19
O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n Interview with Eugene C.
Hargrove..... Magda Costa Carvalho

绿色书评 BOOK REVIEW

- 布莱恩·特雷纳：《阐释美德：环境美德伦理的叙事进路》..... 保罗·浩特/文 张卫/译 P33
Brian Treanor. *Emplotting Virtue: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Paul Haught P38
萨蔓莎·哈维：《横跨大西洋的先验论：柯勒律治、爱默生与自然》..... 罗伯特 L·查普曼/文 张卫/译 P42
Samantha C. Harvey. *Transatlantic Transcendentalism: Coleridge, Emerson, and
Nature*..... Robert L. Chapman P46

自然随笔 NATURE ESSAY

- 荒野美的追寻与保护：参观约翰·缪尔纪念公园有感..... 高山/文 P49
John Muir's Pursuit of the Beauty of Wilderness and his Protection: My Visit to the John Muir
Memorial Park..... Shan Gao

致谢 ACKNOWLEDGEMENTS

约稿函 CALL FOR PAPERS AND INTERVIEWS

■ 绿色访谈

论环境哲学：尤金·哈格罗夫访谈*

文/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赵红梅 高山/译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尤金·哈格罗夫教授，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环境运动开始引起哲学家的关注时，您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那时您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您是如何开始您的环境历险的呢？

尤金·哈格罗夫：

我在撰写维特根斯坦和伦理学的学位论文时，我也尽力保护一个叫魔鬼冰柜的洞穴免于水污染，对此我已经探索了多年。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环保人士指出我是一名专长在伦理学领域的哲学家，因此应该做点环保主义者可以使用的环境伦理研究。我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做了一年维特根斯坦博士后研究后只身返回美国，没有找到工作。我申请了一份洛克菲勒环境事务基金会奖学金，目的是探讨我和对手在我竭力保护洞穴期间争辩时所使用的思想史。当我在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做研究工作期间，我注意到国家人文基金会正在支持关于技术和人文的课程发展机构。我拜访了国家人文基金会的一位行政人员，并且提议国家人文基金会也考虑做环境伦理学研究。那位行政人员告诉我，我需要出一本环境伦理学方面的跨学科的书作为课程发展的基础。最终我想到创办一份环境伦理学杂志，这将会是产生这一主题资料的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在新墨西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一个环境组织的帮助下，我努力促使杂志诞生。我有足够的钱出一期杂志。令人开心的是，这一问题产生了足够支撑杂志延续的订户，而现在是杂志的第36年。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您是指您创刊于1978年的《环境伦理学》杂志吧，现在成为环境伦理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杂志。论文和辩论的核心已经在过去几年里塑造了《环境哲学》的研究。作为杂志的编辑，30多年来的活动里，什么是您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您们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尤金·哈格罗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学术界哲学领域里能有一种称之为环境伦理学学科的想法是很难想象的。部分原因是成为教授的人们所学的哲学史偶尔会反环境。根据古代哲学，有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我们知道的世界（变化的世界）是一种假象，而真正存在的世界是永恒的、不可毁灭的和不变的。从这一视角来看，没有自然保护的空间，因为如果世界是不可毁灭的和不变的话，世界不需要保护。在现代哲学里，有一个认识论问题。笛卡尔提出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即我们是否能够知道这个世界存在。同样，如果连世界是否存在都不清楚的话，很难关心对世界的保护和认真对待这个世界。因为这种反环境论不言而喻立于哲学史，我的研究生课程老师们很难想象环境伦理学能成为一个学科领域。同时，对环保人士来说，处理这些哲学问题很可能被视为太深奥了以致于研究论文被看成是可笑的。因此，尤其在杂志早期，总是陷入失败的可能，因为杂志对于环保人士来说哲学味儿太浓了，没有实用价值，而对于哲学家来说，杂志又不够哲学，杂志由于太实用而不被视为真正的哲学。还有一个问题，如何使学科与环境政策制定者相关，这是一个依然在持续的问题。除了生物学家有时进入决策制定领域，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来自经济学、公共管理和社会科学，几乎没有哲学背景并且很少关注此类学科。他们深受经济学影响，（错误地）声称经济学要独立于哲学伦理学。实际上，经济学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情绪论的幼稚混合物。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现在的世界很清楚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大部分的环境问题需要在政治层面解决。例如，政治家知道在任何竞选活动中，环境都是一个必须的主题。那么就“环境”而言，您是如何看待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呢？

尤金·哈格罗夫:

正如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曾经提出的，伦理学是从个人角度来看，政治学是从群体立场来看。奥尔多·利奥波德在他的著名论文“大地伦理”一文中同样做出这样的结论：同样的道德品质可使人们成为道德个体也可以使他们成为好公民。利奥波德也认为政府可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是有有限制的，并且他认为人们需要伦理学是因为它能弥补政府能为他

们做什么和需要他们做什么之间的鸿沟。此外，马克·萨戈夫在他的《地球经济》一书中指出，作为公民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应该做什么之间有一个对比。经济学家一般以在支付意愿为基础进行调研来决定公共政策。然而，结果常常显示我们的消费者偏好不同于我们的公民偏好。根据萨戈夫，基于消费者偏好的政策是一种类别错误。决定政策的最好办法可能是民主选择，藉以依赖的决定更可能凭借群体和社会的善（通过政治伦理可以发挥更主要的作用）而不是个人的善（可能更强烈地关注个人经济利益和消费主义）。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您也是环境哲学中心主任，一个成立于1989年的重要研究单位。目前在北德克萨斯大学，环境哲学中心的主要活动是针对学术目标，或者您还有其他目的，比如对公众的环境意见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澄清？

尤金·哈格罗夫：

杂志最初由新墨西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的非营利环保组织持有。他们拥有一年的运营协议。年底时，他们对于接下来的协议应该是怎样的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结果，他们通知我，如果我创建一个新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就会把杂志交给非营利组织。于是，我创办了非营利的环境哲学公司，公司成立于1980年秋季。公司成为杂志的持有者。1981年，杂志迁至佐治亚大学，多年以后，我们决定非营利组织需要一个中心而不仅仅是一间杂志办公室。资助机构一般认为杂志是一个很糟糕的小型企业，它需要外来资金救济才能生存。然而，隶属于中心的杂志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资产。因此，中心的创立增加了非营利组织获得资助的机会，只要它决定申请的话。1989年，中心成立了。实质上它是“环境哲学中心”公司，尽管“公司”二字没有包括在名字中。一年后，中心和杂志迁到北德克萨斯大学，又过一年以后，该中心也被认可为大学的一个中心。

该中心的目的是作为各种活动的管理者而服务，首要的活动是出版杂志。此外，当主流出版公司不再从经济上考虑他们的可行性时，该中心建立了一个小型图书再版系列以保持环境哲学重要书籍的出版。中心偶尔主办和协办会议和研讨会，它也是为世界各地访问学者而服务的大学研究中心。最近，中心开始与北德克萨斯大学和智利的麦哲伦大学一起

着手亚南极生物文化项目，目的是帮助推进南美洲南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好望角生物圈保护区的教研活动，包括大量的编辑项目合作工作，最终由大学出版社和其它出版公司出版。该中心定期在美国协办国际环境伦理学会，并且已经成为中国和非洲会议的协办单位。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在过去的几年里，您欢迎在基于生物文化的视角上以区域研究方法来研究环境哲学，比如亚南极生物文化项目。该项目由理查德·瑞兹和奥莫拉基金团队以及智利的奥莫拉民族植物园承担开发。您认为这应该是环境哲学的未来吗？

尤金·哈格罗夫：

理查德·瑞兹的爷爷是一位药理学家，他研究智利本土医药的价值。尽管一开始瑞兹是一名音乐作曲家，当他被要求代表他爷爷的作品做一发言后，瑞兹是如此好奇他爷爷所做的事情充满好奇以致于他想知道他国家的本土居民了解什么样的传统生态学知识。结果，他改变了他的职业轨道，获得了硕士学位和生态学博士学位，他的硕士学位是环境哲学。他的研究重点是南美最南端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好望角生物圈保护区及其部落。他最感兴趣的是亚格汉斯，就是查尔斯·达尔文曾经与之接触最多的土著群体。瑞兹还证实了他国家的欧洲智利人并不熟悉他们国家的实际生态。大多数能命名的植物通常是全世界西方化国家的进口植物，比如苹果树。相反，土著人知道很多有关他们国家的动植物的生活，但是他们并没有使用这种知识的职位，也很少有人问及他们知道什么。因此，他们对于环境政策的可能性影响是未知的。这种研究方法不是环境哲学的未来但是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全球土著传统知识是不同的，它对环境哲学的影响仍将保护地域特色。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这让人想起“全球本土化”概念：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放眼全球，但应该立足当地。您认为我们应该努力构建一种适合于每种人的环境哲学……抑或是不可能的（或甚至不需要的）任务？在环境问题上，建立一种普遍的规范，把特定的对自然的义务施加于所有人类是不可能的吗？

尤金·哈格罗夫:

我不熟悉“全球本土化”这一术语。但是“放眼全球，立足当地”是个很熟悉的口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最可能做的是采取行动来保护他们当地和国家的环境。除此之外，就捐款来说，他们必须为国际环境组织工作或在国际事务上为政府服务。然而，尽管一种普世环境哲学或伦理学是令人渴望的，它很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一种与地方文化相协调的环境伦理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与地方文化协调，就会被人们当作殖民、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例如，美国国家公园和荒野的概念，在亚洲和非洲被拒绝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从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元素中发展一门环境伦理。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相似的情况就会出现，他们可能成为国际或普世的一部分。全世界可以接受的是，从多维度来看，所有的部分必须是合理的。当然，一些跨文化的借用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这种借用事先是不可预测的。例如，中世纪晚期，中国美学观可能影响到欧洲自然或景观美学。早期的不规则花园经常被称之为中国园林。然而现在，自然美学是十足的西方维度并且文化借用已被遗忘。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您在1989年《环境伦理学基础》一书中发展了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把什么看作是环境哲学的哲学基础？影响您的哲学家主要有哪些？

尤金·哈格罗夫:

我深受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影响。他的哲学致力于解开哲学困惑，并且使看起来不可调和的问题消失。我总是被指责为一名实用主义者，这种指责有一些根据，因为维特根斯坦自己受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斯的影响。环境实用主义者，主要受约翰·杜威影响，约翰·杜威的研究工作对经济学、社会科学、环境政策都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我认为所有的价值不应该被认为是工具价值或使用价值。

当我试图保护我早先提到的洞穴，我的书与实践产生的论争紧密相联。我决定就涉及的各种论争的源起进行历史探讨。在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上，这种研究有助于解开哲学困惑，因为许多论争被处理为事实陈述实际是基于已被遗忘的假设。通过引出一些经常与今

天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设，或许可能使看起来无法调和的问题消失。例如，我的对手从土地拥有权的角度争论允许他们毁坏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而不用考虑社会整体。这一观点出于已经存在的古德国土地使用实践，当时罗马人在公元100年左右遇见他们。这一土地实践随着德国的征服而扩展到北欧，1600年后由英国人带到北美。这一观点被约翰·洛克在英国的财产理论和汤马斯·杰斐逊的作品做支持。这一有问题的假设是这一主张：土地拥有者有权依据土地的使用来拥有土地，没有一个人应该被剥夺财产，因为它假设这个星球上有比人类使用过的更多可使用的土地，但这一假设在今天看来不是真的，而且很可能永远不是真的。

我的书也受到对西方哲学一个相当标准的批评的影响。我自己的老师在了解我开始开创一个叫环境伦理的领域是很困惑。不像其他的学术学科，专业的哲学有自己的历史并且教学。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特点阻碍了人们思考环境的能力。正如我提到的，古希腊哲学把我们事实上生活的世界看成是虚幻的，并认为一切真正存在的东西（在视觉之外）是永恒的、不可破坏的和不变的。在这样的哲学情境下，环境保护不会真正发展。与此类似，现代西方哲学由于笛卡尔的努力证明我们能知道这个世界存在，并产生同样的结果。尽管哲学家接受自然保护是必要的，但他们所接受的哲学史的训练使他们很难形成对环境问题的哲学争论。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这本书已经对环境哲学的争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个是“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辩论。您认为今天这仍然是一个应被提出的重要争论还是这一问题已经被讨论得太多？

尤金·哈国罗夫：

我想这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参与的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学家一般来说坚信：把所有的价值看成是工具的或使用价值是环境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环境伦理最初做出的努力之一就是解决这一问题。倍尔德·克里考特发展了主观非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的观点。霍姆斯·罗尔斯顿和保罗·泰勒发展了一个客观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概念，而现实主义者的诺顿则发展了一种视野，他以某种方式努力不使用内在价值这一观念（他声称他已经绕过这一问题）而使工具主义的观点起作用。我的立场是弱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努力调

和这些理论，遵循着维特根斯坦，使这些问题消失。尽管成人很大程度上被当前反内在价值的现行环境政策中的现实环境主义所灌输，但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将是教小学生内在价值这一词汇，这样当他们长大后不至于认为因为事物本身去珍视它仅仅是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的他们的感觉如何。如果小孩不被策略的教育所有的价值都是工具性的，那么内在价值在他们后来的人生中就不是一个问题。

在哲学圈子里，关于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概念已经讨论足够多了，但至少是说英语的国家里这一问题永远不会消失，因为环保主义者与公众倾向于不把自然看成是具有工具价值的，但他们使用“内在的”这一术语也有麻烦。试图以“固有的”来替代也不是很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很高兴地去谈论非工具价值和一些因为其本身而具有内在价值的事务。但他们依然想要不仅仅是“非工具的”这一术语，他们说物种或生态系统和其他的事物应该享有权利，这很容易陷入权利的说法。尽管权利的说法表明他们在情感上有强烈感受，但他们通常不会去证实它，因为不太可能理解自然的权利应该是什么。权利是对利益的保护，但不太清楚物种或一个生态系统的利益可能是什么。简单地把物种的个体成员或生态系统的利益添加并不起作用。“内在的”这一术语与“工具的”这一术语有悠久的历史。直到实用主义者决定把价值归结为工具价值这一术语的时候问题才出现。没有好的理由相信内在价值这一术语不会回到21世界之前的有意义的使用中。我不知道这一问题是否能解决，但如以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很可能在小学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方法是给孩子一个平衡的价值体系的词汇。这样，当他们长大后，他们就不会通过哀叹自然应该拥有权利这一点而对官方的价值体系表达失望。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在这场关于环境哲学的争论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中，您如何定位您的写作？

尤金·哈国罗夫：

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术语有一些混淆。有时在公众中至少是说英语的国家里，人类中心也指的是“工具性质的”。人类中心主义也有“集中在人类所关心的事”这一含义。它排除了这一思想，即认为自然界中的东西具有内在价值。科里考特接受了另外一种含义，他

认为我们能够因为事物本身而把它们看成是有价值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仅以人类所关注的事情为中心，这时我们就是持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我认为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去评价，但这样做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或者是“人类的”视角，而这不一定是只是狭隘的关注其工具价值。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些工具价值，但它也有内在价值。我把这种观点称作是“弱势人类中心主义”，而与之相对比的则是“强势人类中心主义”，它把自然看成是仅仅具有工具价值。

自然界中的东西可以是具有工具价值、内在价值或者两者都具有。很多的昆虫对鸟儿具有工具价值，但对人类却没有。既然它们对人类没有价值，我们可以说它们在非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是具有价值的。从工具的意义上来使用环境的有机体（就它们自己来说）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因此也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意义上具有价值。从工具的意义上来有利于人类的有机物（例如吃昆虫的鸣鸟）对人类来说具有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工具价值，也可以说具有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内在价值（因为人类喜欢听 鸟儿歌唱）。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珍视 鸟就如我们珍视艺术作品一样。

也可能把美学意义上的价值看成是具有内在价值或具有工具价值，但从工具的意义上来讲美学的价值会导致不幸的后果。如果一个自然物被认为是仅仅在工具的意义上来具有价值，因为观看这一客体的人类从工具的意义上来得到快乐（这被认为是内在的具有价值）。经理可以得出结论增加参观者的数量就会增加这一物体的价值。然而这样做会毁坏自然物，慢慢地减少它们从工具的意义上来产生快乐的能力。因为这种类型的价值需要人类的参观才能是具有价值，那么保护这个物体使之不被参观就不被认为是一种选择。我把这称做“对这一自然物的审美消费”。因为艺术博物馆把艺术的物体看成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而不是具有工具价值，它们通常会暂时或永久的把这一物体移出被参观的名单之列，以此来保护它。他们那样做并没有减少它官方审美价值。美丽的物体在审美上具有价值并不是因为他们给我们带来快乐。而是它们因为自己的美丽而给我们带来快乐。

一个研究生最近向我指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关注最近有些误导。女性主义者关心男性的控制并谈到大男子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一问题看成是父权制的。同样，正如我的学生所注意到的那样，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男权主义。聚焦男权主义，人们或许会说它是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因，根据这一点，自然仅仅在有利于人类的

工具的意义上有价值。相比之下，弱人类中心主义被认为是以下事实的自然结果，即我们人类注定要从人类的视角来看自然，而并不知道如何从一些其它生灵的角度来看自然，在沉思的情况除外。弱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人类特权的结果，它并不是完全关注工具性的人类的利益，对自在的评价自然有留有空间。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您如何把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对动物的伦理考虑放在一起？您知道，环境伦理和动物福利非常接近。在从某种程度来说，后者努力成为一个自发的应用伦理。1992年，您从环境的视角编辑的一本书叫《动物权利/环境伦理的争论》。

尤金·哈国罗夫：

当环境伦理学杂志开始出版时，一般认为，动物福利伦理（基本来说是指继彼得·辛格之后的动物解放论和汤姆·罗根的作品后的动物权利理论）和环境伦理是同一伦理的一部分。这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动物福利伦理关注个体，而环境伦理是多元的，它关注物种和生态系统而不是物种和生态系统中的个体成员。第二、有两种不同的动物团体，它们被区别对待：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1980年冬季版的《环境伦理》杂志中，科里考特写的一篇文章“动物解放：一个三角恋”使动物福利伦理和环境伦理的紧密关系脱节。科里考特论证说，尽管动物解放可以被看作是人际伦理的延伸，但环境伦理，尤其是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来说，它是以多元的视角来看的，因此并不是人际伦理的延伸。除此之外，他还指出，痛苦——这一动物解放运动的关键仅仅是信息，从功利主义角度看并没有好坏之分。因为当痛苦通知这个有机体对它身体所作的伤害时，这种痛苦就是好的。这篇论文所导致的结果是一个新的团体和出版机构被创造出来关注动物福利伦理。这个团体和出版机构都没有存活下来，这继续着动物福利和环境伦理之间的鸿沟。

由于与人类密切的动物和与野外密切联系的动物是不同的，这样也可能达成一些和解，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不同的伦理路径。一些类型的权利对家养动物是可行的，因此它们通常被看作是具有名字的个体，而且人类对它们的行为有期待，而这些动物是理解这种期待的。然而，这些权利总的来说比较弱，因此不能成为人类权利的好的典范。总的来说，权利并不适合野生动物，因为努力执行权利会导致生态系统的个体中一些不可能的冲

突。因为动物在野外是彼此相食的，每个个体的生命权不起作用，如果实现这种生命权的话，会导致一个不自然的自然界。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在您的书和论文中，您既提到了环境伦理又提到了环境哲学，您如何看这两者的差异？

尤金·哈国罗夫：

这两个术语差别不大。当我开始创立这本杂志的时候，这一领域还没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我选择“环境伦理”而不是“生态伦理”的原因是我想要应对的不仅仅是环境科学的问题。我选择伦理是因为我想让这个杂志仅限于关注伦理与价值问题。然而，“环境伦理学”这个名字尽管对我的杂志来说还好，但对这个领域来说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个领域包含着几乎所有哲学的元素，或许只排除了逻辑学和数学哲学。在我写的《环境伦理基础》的序言中，我注意到这个领域应该被命名为“环境哲学”，这样会把很多分支的领域例如美学、科技哲学、社会和政治哲学甚至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考虑进去。但尽管如此，对某一群体的人来说，环境伦理仍是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名字。在一个非学术圈子中，这个名字很起作用，因为公众认为伦理学很重要，而哲学则是无聊的而且很神秘。在哲学领域之外的圈子中，“环境伦理”能被看作是一个流行的术语，甚至是一个教派的术语。因此，在一个专业哲学环境中，“环境哲学”更好。一个出版公司的哲学编辑曾经告诉我，用环境伦理学做标题，它能卖出任何东西，但用哲学做标题却很难。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那么月球保护，另一个您所关心的环境伦理如何？您认为这是人们应该关心的吗？既然环境一般被看作是地球环境，那么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当您在谈话中提到这一主题的时候，您认为公众会不会有强烈的反应？

尤金·哈国罗夫：

1985年，我组织了一个关于空间计划伦理问题的会议，该会议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一年后，会议上的发言汇成了一本书，名为《在空间地球之外：环境伦理与太阳

系统》。我被一个艺术家/天文学家威廉·哈特曼的观点所激发，他针对我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一个巨大的促进组织，例如美国的星球协会或国际空间协会将变成一个环保运动组织，前提是这些空间机构所做的一些事情不被这个协会批准。塞拉俱乐部在21世纪的前半个部分做了这样的转变。几年前，我组织了由国家科学基金支持的第二次会议，谈我们人类发现外星生命如何处理。之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让我谈谈在月球上建立基地的事情，这包括在月球上采矿来获得氢的燃料。大概一米深，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需要挖出来。我认为未来在月球上有很多审美的兴趣。如果我们需要再那儿建月球基地并且在那里采矿，这样已经通过摄影和电影逐渐爱上月球的人们会出现哈特曼所境界的环保运动。因此，我认为所有的空间结构应该留意他们所做的，再粗心大意的削减他们在月球上活动的支持。我的建议是月亮的可见的方面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址，采矿仅仅在月亮的后面进行。在19世纪，每个被重要的画家和摄影师涂抹的自然区域最后成为了一个国家公园或国家纪念碑。我认为在月球上的局势与在太阳系中其它天体的局势相同。既然月亮和太阳系中其余的部分目前来说相对比较安全，不受不可遏制的资源枯竭的影响，公众发现它们很有趣，像其它外部空间的话题一样，但还没有公开关心。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您也有其它的兴趣，更多的是在小说中所描述的自然，既然您已经是个研究托尔金作品的专家，指环王只是一个风靡一时的人物。在拖金的作品和环境保护中有什么联系吗？

尤金·哈国罗夫：

托尔金的作品与自然保护之间有一些联系。书中坏人和邪恶的人意在破坏环境。也有可能享受这种冒险，把它看成是自然中的漫游。我认识几对夫妇，他们一年为彼此读一次这本书，只是为重新体验这一旅程。在这一故事中也有两个背景人物，代表着对自然保护的不同方式。第一个人物是汤姆·八木迪，它管理靠郡县很近的古老森林，偶尔会给他的女士摘些荷花。他通过给他们演唱特殊歌曲在控制植物。另外一个法贡，一个能走能谈话的生灵，但看起来像一颗树。他管理这个充斥着号角生灵的森林，这种盛林很像他，但不太理智和具有感觉。这些生灵都是男的，但也有叫安.的妻子，这些妻子离开了丈夫去

从事农业实验，并在两岁时的一场战斗中被偶然杀死。他们和植物说话，与他们互动个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当这些和他们说话时，他们都想让这些植物遵守。

然而，我对拖金作品的兴趣并不主要是环境上的。拖金最初为英国发明一种与芬兰的民族史诗类似的神话感兴趣，民族史诗在使芬兰人意识到他们在19世纪是一个民族这一点上功不可没。托尔金后长期未发表的手稿成为他的两本畅销书，即霍比特人和指环王的背景历史。背景材料介绍得很少，并没有充分的解释，而相似的材料会被介绍到非小说的作品中。除此之外，指环王的写作好像是主要角色弗罗多在朋友的帮助下写了他所记载的叙述。最终带来了对实际上发生什么的一些误会。总之，这本书基本上是一部非小说类的作品。这种类型的学术没有真正的意义，但它却很有趣。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从小说或非小说的视角对这些概念进行写作之后，您认为当面临真实的和非常严重的环境危机时环境哲学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在1971年，约翰·考博的书已经在问，是否太晚了……您认为现在的2014年是否太晚了，或者还有希望吗？

尤金·哈国罗夫：

关于考博的书，我重新印刷的修订版，这表明没有很多进展。他的书可以以今天很多相同的观点来写，但能使用很多不同的和当前的例子。环境哲学还没有产生在其它新兴领域中常见的影响力。这里有许多原因。第一是主流的哲学对新兴的应用哲学还不是很感兴趣，因此还不支持这些领域。尽管一些哲学博士培养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也教环境哲学，但一般来说它是那些系几个教师努力的结果。哲学中没有一个主流的计划会选择致力于建立一个这样的核心领域。这些年来最重要的项目一直是是我恰好所在的那所大学和这本《环境伦理》的杂志。英国的蓝开斯特大学确实想同北德州大学的哲学系项目竞争过一段时间，但很快把这一重心丢弃，大多数环境专家也很快分散到其他大学去了。相比之下，历史上的博士项目很快接纳了环境历史。这样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有了三十几个这样的计划具有这样的专业。一个大的问题是，从很大程度上说，只有生物才是跨学科的，它们支持环境哲学。一直很容易找到生物学家来写这一话题，生物系经常很支持环境哲学。从某种程度来说，只有生物学家才从跨学科的角度支持环境哲学，环境哲学在那一领域中找到

了生存之道。然而，环境政策一直被经济系的研究生、公共管理机构和相关的社会科学所支配，他们不鼓励学生选一般的哲学课或更具体来说是环境哲学。经济学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逻辑的情感主义的很奇怪的混杂体，但它宣称要独立于哲学与伦理学之外。例如，弥尔顿·弗莱曼开始写书，名为《积极经济学论文》，在第一页和第一段，他宣称，如果经济学只关心是什么，而忘记它应该是什么，那么经济学可以被看成是一门科学。即使在我自己的大学即经济学、商业学、公共管理与社会科学，也不鼓励他的学生学习环境哲学。如果进入环境政策领域的人们继续对这一领域无知的话，那么它的影响力将会很微弱。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然而，尽管前景不容乐观，您仍然能将美捍卫是终极的环境价值...那么美是人类最终的支撑吗？

尤金·哈国罗夫：

利奥波德于1933年写了一本书叫《猎物管理》。在这本书中，他论证到有可能把环境中的变量隔离起来，因此来解决产生的问题。然而，仅仅在几年之内，利奥波德不再对有效控制环境的可能性存在幻想。他得出结论说，无论人们做什么，他们的行为总会产生一些无法预见的后果，因为变量在物理和化学中是不能被分割的。我把这叫做环境治理上的虚无主义，与19世纪在医学中的悲观主义想法类似，那时医学有局限，努力治疗病人总会使他们更糟糕。

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中写到，“一件事情，当它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就是正确的。”它仅仅说它“倾向于”，因为任何努力的结果对他来说都是不可预测的。这三种因素有帮助，但并不精确，因为利奥波德认为我们对在自然中进行的许多事件都很无知，而且永远都是。尽管他首先提到完整，但利奥波德不太可能知道如何去应用。只有在最近，一个哲学家劳拉努力使这一术语更精确。稳定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稳定与多元性相互联系。早期利奥波德认为多样性创造了不稳定性，它因此赞成单一农业。后来，他的思想又有所改变，他认为多样性促进了稳定。然而，有可能这一联系依赖于特定生态系统稳定的因素，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具有特点的多元性。北美的生态学家一般来

说认为多元性促进了稳定性。然而，在这些热带系统中工作的人经常认为系统的多样性使它们很不稳定而且脆弱。在我看来，美丽是三者之中最强大的部分。一个熟悉生态系统的人经常能在审美的立场上辨别一个生态系统是否是健康，即使他或她不可能知道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就如人们能经常辨别一个人是否是生病了，而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这个疾病。

关于自然保护，美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欧洲人认为自然在中世纪时是不美的。对自然的爱被认为是对上帝之爱的偏离。在现代早期，神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了，因此有可能通过自然爱上上帝或把上帝与自然放在一起来爱。人们经常把自然这一单词的字母大写来强调这种相近性。对自然的审美欣赏源于对风景画和摄影作品的审美欣赏。这一发展直接导致了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的自然保护。大多数由19世纪重要画家画的自然物或重要摄影师拍的照片现在成了国家公园或国家的纪念碑，始于约塞米蒂与黄石公园。完整与稳定并不是相似思想史的一部分。进一步来说，对自然的审美欣赏并不仅仅限于风景画和摄影的延伸，因为自然的科学信息，自然在科学上的兴趣，也会产生审美体验，因此会促进环境保护。我们就自然美和科学的兴趣了解越多，我们就越会在乎这个星球之上或之外的新的方面，并且想保护它们。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当然，这才能真正的环境哲学。哈国罗夫教授，非常感谢您付出的时间与慷慨支持！

*注释：本文原文刊登于 Portuguese Magazine，经刊物主编和作者授权将翻译稿刊登在《自然与人生》电子杂志第6期。作者是：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里斯本大学哲学中心副教授，亚速尔群岛大学，email:magdac@uac.pt 尤金·哈国罗夫：美国北德州大学环境哲学中心主任，email:hargrove@unt.edu. 译者为赵红梅，现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美学，email:zhm-1212@163.com.